



風

雨年华

黄秋耘◎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風

雨
年
華

黃秋耘◎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廣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雨年华/黄秋耘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9. 11
(新中国 60 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

ISBN 978-7-218-06558-8

I. 风… II. 黄… III. 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3951 号

策 划	金炳亮 钟永宁
责任编辑	余正平 何丽娟
整体设计	张竹媛
责任技编	周 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印 刷	韶关二九〇研究所地图彩印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1
插 页	2
字 数	220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8-06558-8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 <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 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 020-83780120 83790604】

《新中国 60 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

编 委 会

主 任：林 雄

副主任：顾作义 廖红球

委 员：孙丽生 廖 琪 张建渝 吴佳联 郑广宁
金炳亮 温远辉

主 编：廖红球

副主编：孙丽生 廖 琪 张建渝 吴佳联 郑广宁
金炳亮 温远辉

编 辑：范英妍 李艾云 展 锋 严瑞昌 易小淬
钟永宁 谢海宁 余正平 黄丹宁 陈 宁

春华秋实 岁月如歌

——《新中国60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序

林 雄

新中国迎来60华诞！

60年，波澜壮阔，江山如此多娇。在党的领导下，华夏儿女谱写了最壮丽的甲子华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展现广阔前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地处南疆的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实验田，这片热土翻天覆地的辉煌成就，恰是我们的国家沧桑巨变的一个精彩缩影。在经济发展、政治昌明、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新形势下，南粤人民正以科学发展的新业绩向共和国生日献礼。

60年，百花齐放，风景这边独好。经由两千年深厚底蕴的岭南文化滋养，岭南文学立足广东，面向全国，紧贴时代变迁、社会发展、民族进步，以大量优秀的作品生动展示新中国奋斗历程和宝贵经验，热情讴歌党和人民伟大实践的丰功伟绩，充分反映南粤人民精神面貌发生的可喜变化，为现代化建设事业勾勒出生动的发展图景，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岭南文学的繁荣壮大，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煌煌宝库。

在隆重、热烈、喜庆的浓厚氛围中，广东省作家协会组织编辑出版《新中国60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一套31部作品，给人民共和国奉献上一束小花，以表达广大文学工作者拳拳爱国之心。

这是岭南文学成果的一次展示。丛书收入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较具影响力或代表性的作品，当中有《三家巷》、《花城》、《香飘四季》、《月夜》、《风雨太平洋》（第一部）、《山乡风云录》、《风雨年华》、《虾球传》等脍炙人口的名家名作，有《大风起兮》、《天堂众生录》、《围龙》、《商界》、《苍天厚土》、《大江沉重》、《终结于2005》、《中国式燃烧》、《秋露危城》（《白门柳》第二部）、《依然是你》等备受好评的精品佳作，有《南中国碣石玄武山》、《瞬间与永恒》、《落草集》、《高原苦旅》、《成长1984》、《血脉的回想》等散文、诗歌，有《庄世平传》、《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现代化脚印》、《守护生命》等纪实文学、报告文学，也有《中西比较文艺学》、

《想象中的时间》、《心灵的见证》、《文学的路标》——1985年后中国小说的一种说法等文学理论、文学评论。这些作品或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洞悉社会万象的本质，或以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树立思想道德的楷模，或以民族的优良传统指引价值的取向和行为的准则，积极传递高尚的情感境界、健康的人生追求、美好的艺术情趣，真正体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拓展了岭南文化的内涵。

这也是岭南文学队伍的一次检阅。入选丛书的作家，既有自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享誉国内文坛的名家大家，也有在改革开放31年间取得不凡成绩的优秀作家。他们始终坚持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主动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积极适应人民群众审美情趣、欣赏习惯的深刻变化，大力推进文学内容和形式的不断创新，实现题材体裁、风格手法的极大丰富，展现出了务实、开放、兼容、进取的作家风貌。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抗击“非典”疫魔期间，33名作家奔赴医务第一线采写作品，充分表现出了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血肉情深。多年来文学创作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也激发了岭南文学创作的生机和活力，创作主体的构成形成了层次多、覆盖面广的局面，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的文学作品源源涌现。

60年，激扬文字，春华秋实。《新中国60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的推出，恰逢其时。在作品征集、推荐筛选、审阅整理等环节程序上，省作协尽力做到科学周密、严谨细致，尽可能把读者公认、反响良好、最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推选出来。丛书的编辑出版，获得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的重视，得到全省广大作家以及部分已故作家的亲属之大力支持。广东人民出版社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积极宣传岭南文学，如期顺利出版丛书，可喜可贺！正所谓“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芒”，31部代表性作品，基本上能够反映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岭南文学事业的发展历程和各个时期取得的可喜成就。

60年，弹指一挥，岁月如歌。继往开来，壮丽的事业呼唤优秀的作品，伟大的时代造就杰出的作家。改革的时代，变革的社会，发达的科技，火热的生活，仍将为文学创作提供广阔舞台和丰厚土壤。东方风来满眼春，期望我们的作家继续当好人民心声的代言人和时代进步的记录者，阔步迈向欣欣向荣的文学前程。

2009年8月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目录

- 一 “一二·九”啊，我的起点 / 001
- 二 到民间去 / 006
- 三 内部斗争 / 009
- 四 秘密使节 / 015
- 五 回到北平 / 019
- 六 “卢沟桥事变”前后 / 022
- 七 从南京到武汉 / 029
- 八 “银弹”的秘密 / 033
- 九 奋战南疆 / 037
- 十 大风书店和西营监狱 / 043
- 十一 “青知之夜，是何等光亮！” / 050
- 十二 太平洋的暴风雨 / 053
- 十三 我所认识的乔冠华 / 059
- 十四 记“七战区编委会” / 061
- 十五 身在曹营 / 065

目 录

- 十六 “东纵北撤”前夕 / 068
- 十七 我走上了文学道路 / 073
- 十八 一个情报参谋的手记 / 077
- 十九 进城以后 / 082
- 二十 “三反、五反”运动一瞥 / 086
- 二十一 “榕城”春秋 / 090
- 二十二 中国作协的几番风雨 / 095
- 二十三 不寻常的夏天 / 104
- 二十四 三面红旗 / 113
- 二十五 三件可怕的事 / 118
- 二十六 “中间人物”事件始末 / 122
- 二十七 神秘的“四清”运动 / 125
- 二十八 暴风雨的前夕 / 130
- 二十九 在夜气如磐的日子里 / 135
- 三十 荒原上的狼群 / 148

三十一 “九一三”事件前后 / 154

三十二 为跌下来而建造的塔 / 160

三十三 丧钟为谁而鸣 / 169

简短的结束语 / 174

“二·九”呵，我的起点

一九三五年夏天，我在香港一间爱尔兰人创办的中学毕业以后，一共考上了香港大学、伦敦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和中山大学五间大学。我的父亲是香港一家西药房的老板，他当然希望我克绍箕裘，继承世代相传的祖业（我的祖父黄藻云也是一个著名的中医生），进香港大学或者伦敦大学学医。我以优异的考试成绩获得了这两间大学的奖学金，并不需要家里花多少钱。但，由于受到舅舅、南社诗人马小进和叔叔黄恕和的熏陶，我从小就养成了对文学的兴趣，爱书本子，爱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特别是爱读中国古典诗词，只愿能够考进北平清华、燕京等名牌大学，在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俞平伯等名师指导、栽培之下，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即使当不上作家，至少也可以在大学或中学里做个胜任的国文教师，度过这一生，也许会比做医生更为惬意一些。加以当时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怒潮对我有特别强烈的吸引力，与其远托异国，身居海外，钻进实验室和书堆里，毋宁跑到抗日前线的北平，投身于学生救亡运动的激流中，更为符合我的心愿和理想。我的父亲受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对子女一向采取比较自由放任的态度，尊重他们自己的抉择，我很容易就说服了他，放弃了香港大学和伦敦大学的奖学金（这当然也是很有吸引力的），孑然一身跑到北平，挑选了清华大学的国文系，以文学作为终身事业。假如当时我作了另一种抉择，进了香港大学或者伦敦大学学医，也许将会成为一名内科专家，再不会靠摇笔杆子来谋一碗饭吃了。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即使

我选择了医学，后来又改行从事文学，也并不见得没有可能。许多作家都走过这样一条道路，契诃夫、鲁迅、郭沫若……我当然不敢和这些大师们相比，但这至少足以说明在医学和文学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人，都是“人学”，只不过前者是从生理方面来研究，后者是从心灵方面来研究。每一个真正的作家都是人类灵魂的研究者和剖析者，即使不一定配得上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

我终于来到北平。秋天的北平是格外妩媚动人的。西风吹红了香山的枫叶，秋阳映亮了北海的涟漪。清华大学的校址就在圆明园废墟附近，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很容易诱发人们“思古之幽情”。然而，对于我这个刚刚从岭南来到北国的孩子来说，这一切风光文物，丝毫也引动不起诗情画意。北平城外已经强敌压境，兵临城下，战云密布，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谁也没有心情去游山玩水了。连近在咫尺的颐和园和香山、西山，我也没有去玩过一次。同学们朝夕议论不休的，是时局问题，是中日两国之间的和战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命运，不由得我们不感到切肤之痛。

在我来到北平之前，一系列惊心动魄的重大政治事件已经相继发生了。长城以北中国的最后一块领土——热河，已经合并到日本人卵翼下的“满洲国”里去，察哈尔也沦陷了一部分。那一年六月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跟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出卖整个华北的“何梅协定”。根据“何梅协定”的条款，日本军方逐步促使华北“特殊化”，日本驻屯军和汉奸武装，不断制造各种事故，到处挑衅。六月二十七日晚上，在日军的唆使和支持下，自封为“正义自治军”司令的汉奸白坚武纠集了一百五十多名土匪流氓，占领了丰台火车站，夺去一列装甲火车，开往北平永定门，炮轰北平南部市区。日军在“军事演习”中，曾经一度占领北平东面的香河和三河等县城。国民党的冀东专员殷汝耕公开投敌，在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他的武装部队经常到北平朝阳门、东直门和东北郊一带窜扰，造成“渔阳鼙鼓动地来”^①的紧张局势。带着太阳徽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经常在北平上空低飞盘旋。北平市民每隔几天就听到日军在城外演习实弹射击的枪炮声震天价响。日军的坦克车甚至闯进北平市区，在东城区碾死了一个年仅八岁的小学生。

北平虽然名义上还算是中国领土，但实际上已经像一只熟透了的桃子似的，很快就要落入日本侵略者的手中。

北平，这个亚洲最壮丽的、最具有古香古色的都城，岌岌可危，更难消几

^① 古代的渔阳就在今天北京东北边蓟县一带。

番风雨！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句据说是出自蒋南翔同志手笔的名言，道出了当时北平成千上万爱国学生的心声。当然，少数亲国民党的右派学生并不这样看，他们坚信蒋介石制订的“先安内然后攘外”的政策还会长时间推行下去，“剿共”战争一天没有结束，中日之间就不会发生全面的大规模的战争。哪怕北平处于日本华北驻屯军重兵包围之中，也还可以照样歌舞昇平，偏安三五年以至更长的时间，直到他们毕业或者出国留学以后，局势都不会有多大变化。这些人大多数是国民党政府里达官贵人的公子哥儿，他们有点像那些结巢在帐幕上的燕子，居危而不思危，在这危急存亡的关头依然苟且偷安，醉生梦死，每个周末都在东城的六国饭店里酗酒跳舞，寻欢作乐，通宵达旦。

一九三五年最后的一个月，严寒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刚到十二月初，就风雪交加、滴水成冰了。日本人又找寻新的借口，导演了一个流产的政变。有一天，日本浪人和汉奸带领着五六百个流氓和抽大烟、吸白面的“瘾君子”，去中南海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向何应钦代理委员长请愿，沿途叫喊着“中日提携”、“共同防共”、“华北自治”等汉奸口号，一直闯进居仁堂。身为华北最高军事当局的何应钦竟然亲自接见他们，待若贵宾，对他们的要求一一给予圆满答复。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同意撤销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地方政府，由老牌汉奸王克敏、王揖唐等出来主持。这么一来，日本帝国主义者可以兵不血刃，就实现华北“特殊化”，建立第二个“满洲国”。中华民族，真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

在这里，我不想多费笔墨来记述“一二·九”、“一二·一六”的经过，这已经有十多二十部历史著作、回忆录和文学作品详细地记载过和描述过了，我没有必要重复别人已经说得很详细、很清楚的事情。我所要告诉读者的，是作为亲自参加过这两次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的一员，从我的眼中所看到的和心中所感受到的一些东西。

那时候，我只不过是一个刚刚年满十七岁的大学一年级新生，而且曾长期生活在香港。发生在祖国大陆的一切事情，对于我来说，都好像《天方夜谭》般那么新奇和不可理解。但有一点我是一清二楚地看到了的，亡国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了。我虽然天真而幼稚，却忧心忡忡，有一种大难临头的不祥预感。

“一二·九”运动最初是作为一次“请愿行动”发起的，原来预定北平各大学（包括一部分中学）的学生于十二月九日上午十时在天安门前集合，然后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向何应钦和黄郛请愿，主要口号是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自治。在地下党领导下的北平学联采取这一行动是经过周密的考虑和酝酿的，因为只有通过“请愿”的形式，才能把左右两派以至中间派的学生团结起来，倘若一开始就举行示威游行，右派和中间派学生很可能会拒绝

参加，他们认为，示威游行是反对政府的过激行动。但不知怎的，我一听到“请愿”二字就有点反感。我虽然年幼无知，却预感到向何应钦、黄郛请愿绝对不会有什么结果。我知道，在爱国的青年学生和赧颜事敌的高级将领和大官之间，是没有共同语言的，也不可能求得一致的余地。我记得鲁迅先生早在一九二六年就说过这样的话：“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又说：“请愿虽然是无论哪一国度里常有的事，不至于死的事，但我们已经知道中国是例外，除非你能将‘枪林弹雨’消除。”向段祺瑞请愿使不得，难道向何应钦、黄郛请愿就使得么？他们还不是一丘之貉！何况，众所周知，“何梅协定”是何应钦亲手签订的，向何应钦请愿要求取消“何梅协定”，岂不是等于“与虎谋皮”？请愿，为什么要请愿？为什么要向何应钦、黄郛这样的家伙请愿？我虽然对“请愿”极其反感，但毕竟还是参加了“一二·九”那一次行动了，因为我没有选择的余地。

然而，“一二·九”那一天的行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请愿”的目的。西城一带的几个城门——西直门、西便门、阜成门全都关闭了。城外清华、燕京、北平农学院等大学的学生根本进不了城。城内的学生冲破了军警的重重封锁，有五千多人集中在新华门前。新华门紧闭着，何应钦、黄郛都拒绝接见，只派了一名小官员出来敷衍一下。指挥部见请愿不成，就率领队伍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到达王府井大街的时候，迎接他们的不是长官的接见，而是消防队的水龙、保安队的大刀和警察的皮带、枪把。那一天的天气特别寒冷，马路两旁的枯树在北风中颤抖，推水的独轮车吊着一串串冰琉璃，冷水喷在学生的衣服上，很快就结成一层硬壳。有些勇敢的同学奋不顾身，把水龙抢到手中，向军警喷射过去，直射得他们抱头鼠窜。军警也用非常残酷的手段来殴打学生，就连中学生当中十四五岁的小男孩和小女孩也同样被乱打乱踢，形成一场混战，大街上血迹斑斑，伤者遍地。可是，这次不成功的请愿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使广大群众，包括大部分思想保守甚至对国民党还抱有幻想的大学生都从事实中受到教育：向卖国政府请愿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展开坚决的斗争。我感到特别高兴，因为严酷的现实证明了我的想法完全正确，请愿是毫无用处的事。但是我当时又怎能想到，那一天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光辉的日子，值得我们在将近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还要追记它呢。

紧接着“一二·九”一周后爆发的“一二·一六”游行示威是一场更为轰轰烈烈、惊心动魄的群众斗争，城外的学生冲开了西便门进了城，和城内的学生汇合起来。一道由三万多人组成的铁流穿越过北平城的主要街道，队伍中爆发出多年来蕴藏在人民群众的心底而从来没有机会喊出来的慷慨激昂的口号声：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武装保卫华北！

打倒汉奸卖国贼！
撤销冀察政务委员会！
收复东北失地！

.....

学生们如火如荼的爱国热情使北平市民深深受到感动，有些平时胆小怕事的小店主也跑出来迎着队伍鼓掌，许多卖油条大饼的摊贩都自发地拿出食物来慰问冒着凛冽严寒参加示威游行的学生。

时间毕竟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了，只有当时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的那几个场面直到现在还能偶然闪现出来：黄敬攀上电车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说；陆瑾在宣武门前爬进了城门下不到两尺高的洞口，想从里面为大队打开城门，让大家冲进去；埃德加·斯诺跟着队伍采访和拍照；前门外警察向天空放射排枪，子弹呼啸着从我们头顶飞过；宣武门外街道居民给我们准备好了大饼和热开水，一个好心肠的老大娘把煮熟的、滚烫的鸡蛋硬塞进我的手心……这一切都好像一张张退了色的照片似的，唤起我一些模模糊糊的记忆。遗憾的是，世界上还没有发明那么一种显影液，能够把人们脑海中一大堆杂乱无章的、不大明晰的印象重新显现出来。

“一二·九”、“一二·一六”这两个光辉的日子是不可能不在我的生命史上留下痕迹而轻易消逝了的。严格地说，我的生活从那个年代才真正开始。这么说，我的生活还不算开始得太晚，从十七岁起，我就走上坎坷不平的、充满了暴风骤雨、惊涛骇浪的人生旅程，开始认真思考生活的目的和人生的真谛，并且初步树立起后来主宰了我一生的信念。

一个人选择的生活道路不一定是和他的气质很相适应的。在我当时的同学中，有不少意志坚强、精明干练的人，他们偏偏选中了退居到生活的安全地带，远离政治斗争，去做一个专家和学者，甚至做一个外国籍的华裔学者。而像我这样一个优柔寡断、多愁善感、耽溺于沉思和幻想中的书呆子，却从少年时代起就选择了一条充满了政治斗争和危险行动的道路。直到中年以后，毋庸讳言，我的政治素养还是很差，具有太软的心肠和特别敏感的气质——这些都是和一个政治家很不相适应的。由于这些特性的支配，我常常“犯错误”，甚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假如我的气质不是那么敏感，而我的性格又更为粗犷一些，也许我更能适应我们这个动荡的时代和我所选择的生活道路。

! 關 閉 這 個 窗 口
! 會 員 獨 享 特 權
! 歡 迎 光 臨 本 站

事的小組和平些育，在經受清鄉團市平北對青島國慶的暴行大眼門口，
來聯合出拿組或自聯軍的指大系而美達者，拿其出用善惡米出頭出主南小節
。主學的行衛政示武德門哪嘉督官的總

的拿中校署了不用中界出的非五初世育只，下這出个半我科上任意學同
；所給的新書品造非致辛由上擊燃莫，來出頭因然開頭技時既直而部，主部
，門就我計起大仗面里八思，口師的高只兩既不干門就下我學南門海宜的部
耕值意李天同家聲快門前，融出味街家而則音顯漸薄。哦聯說，去報中家大
熱時二大下我番非門非學與似並香快門前宜，長江更夫門舞乃香聯和乾了，似

到民間去
。主學的行衛政示武德門哪嘉督官的總
大不，前章天片宗華大一中新部門人聯聯前，部事是特一公和即我番非的界
。來出頭。我重榮中門的部

史命主帥非計才前更不款于日前就光个兩烈“六·一”、“八·二”
。部我重算下升半个都从部生帥非，部就部。而了重部。洋面整部。部
經過“一二·九”、“一二·一六”兩次游行示威之後，北平學聯決定組織
平津學生南下擴大宣傳團，深入民間，宣傳抗日，發動群眾。參加過“一二·
九”、“一二·一六”運動的清華、燕京、中法、朝陽、輔仁等大學的部分同學
都參加了南下擴大宣傳團第三團，我也參加了。當時我說的北方話，廣東口音
太重，就是在大学生當中，還不能完全通情達意，對於北方的農民來說，恐怕
像鳥叫一樣難懂。與其說，是我對農民宣傳，倒不如說是農民對我進行宣傳教
育。

我是個生長在大城市中的孩子，整個童年和大部分少年時代都是在香港度
過的。大城市中當然也有貧窮和苦難，壓迫和剝削，以至人吃人的悲劇，但許
多血淋淋的慘象都是掩蓋在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帷幕底下的，並不那麼叫人
觸目惊心、毛骨悚然。我過去只是從小說和電影中看到過北方農村的一些情
景，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到舊中國的農村生活貧困和悲慘到這種程度。我們一九
三六年一月四日從北平出發，往南走到河北省中部固安、高碑店一帶，所經過
的十多個縣份都在華北平原，在全國來說，雖然不能算是很富饒的地區，但也
不能算是最貧瘠和飢荒的地區。我們在農民家里搭伙，每天吃到的飯菜，只有
窩窩頭和咸萝卜干，偶然有一碗豆腐煮白菜，就算是“打牙祭”了。我記得，
有一次在農民家里的炕頭上吃飯，一位女同學端着那碗清湯寡水煮白菜緊蹙着
眉頭說：“怎麼啦？今天的白菜湯連一小塊豆腐也沒有嗎？”旁邊的一位老大爺

冲着她冷言冷语答道：“大小姐，俺们这儿，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得上豆腐呢！”

生活很艰苦。在许多农民家中，由于营养不良，年轻的母亲瘦小得像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而三四十岁的母亲却像一个佝腰伛背的老太婆了。我们没有带自己的铺盖，晚间只好盖着农民的被窝睡。这些硬邦邦的、积满了污垢的被窝肯定是有跳蚤和虱子的，人钻进去不到半个钟头就浑身发痒。有些有洁癖的女同学宁肯和衣而睡，也不敢挨近这些被窝，她们害怕会传染上斑疹伤寒和皮肤病，当然更害怕鼠疫。在农家的炕头上，上蹿下跳的老鼠几乎有小猫那么大了呢！

夜间，我睡得很少，却思考着很多问题。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得那么苦，难以想象，仅仅在一百几十里外的大城市里，却有那么一群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达官贵人过着穷奢极侈、荒淫无耻的生活。这难道是公平合理的么？老实说，我的社会主义思想并不是完全起源于阅读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而是同时萌生于那些硬邦邦的、充斥着跳蚤和虱子的被窝里的。

这十多天农村旅行所教会我的东西，比之整整两年清华大学的正规教育还要丰富得多。当时我下定决心要参加革命，而我参加革命的目的，概括起来说：一是要抗日救国，争取民族解放；二是要使做工的、种田的老百姓都能不愁温饱，有间像样的房子和几床干净的被窝，并且做国家的主人。这样就是我心中所向往的社会主义社会了。我认为，共产主义就是人类大同的理想，以人道主义和正义的原则为其基础，最好是不经过流血斗争就能达到这一理想，不得已时也只好通过流血斗争的途径。这自然是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幼稚和天真的想法。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我国原来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加以我们自己在工作上一再犯错误，走了不少弯路，直到革命取得胜利十多年以后，这样的目标还是距离我们相当遥远。农民还是没有足够的食物和房子，农民的被窝仍然有不少跳蚤和虱子，有些人还是过着绳床瓦灶、糠菜半年粮的生活。正如孙中山所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他说的只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即便是这样的革命，也还不能说已经完全彻底完成。正如孙中山慨乎言之的：“尚遗余孽（封建余孽）艰难甚！”（见《挽刘道一》诗）到了十年内乱期间，封建法西斯主义又复辟了，林彪、“四人帮”只不过是蒋介石的变种，甚至比蒋介石还要坏。他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这样使人们更容易受骗上当。

国民党反动派也并不太愚蠢。他们知道，大学生跟农民搞在一起是十分危险的，很容易出乱子，何况这一带的农民群众是参加过“高蠡暴动”和其后多次的武装斗争的，是有革命传统的，让大学生把革命的火种散播在这些干柴枝上，很可能会点燃起不可收拾的燎原大火。因此，南下扩大宣传团第一、第二团到达了保定，第三团到达了高碑店以后，都在国民党武装军警的拦阻和挟持

下，被逼退回到北平。

十多天的南下扩大宣传，对农民的教育极其有限，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倒是非常深刻的。要改变人们的思想，宣传品和书籍不一定能起多大作用，主要还是通过现实生活的教训。我读过一个这样的故事：苏联国际关系学院学生萨哈罗夫本来是一个死心塌地为苏联特权阶层效忠的死硬派。有一次，他去集体农庄“体验生活”，看到苏联下层劳动人民与特权阶层贫富悬殊：集体农庄的住宅，几乎什么也没有；农民在六个星期中，只有四天能吃到面包，其余日子一天三顿吃的都是土豆，他的信心就动摇了。毕业后，他拒绝接受分配给他的某种特殊工作，终于叛逃到外国去。这个故事说明了，现实生活毕竟是最有说服力的，最能打动人心的，而语言和文字，即便是很有感染力量的，也只能起一种“助燃物”或者“催化剂”的作用罢了。

在封建时代，农民起来造反，主要是因为没饭吃，有时连树皮草根也塞不满肚子，所以只好揭竿而起，倒不是由于他们先读了《水浒传》，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才团结起来反贪官、反皇帝。对文字宣传的社会效果不容低估，但是也不宜夸张得过了头。“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事实上可没有那么简单。“若道文章皆祸水，兴亡何必动吴钩？”^① 批判的武器毕竟超不过武器的批判，也超不过现实生活的教训，参加过南下扩大宣传团之后，我自然而然地得出上述的结论。

^① 这两句是廖沫沙同志的诗句。